

文字斋·雅理译丛 田雷 主编

为何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与全球动荡

起火的世界

[美] 蔡美儿 著
刘怀昭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起火的世界

[美] 蔡美儿 / 著

刘怀昭 /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 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起火的世界/(美)蔡美儿著;刘怀昭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20-5391-0

I. ①起… II. ①蔡… ②刘…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 IV. ①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0122号

-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010-58908524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 印 张 13.25
- 字 数 280 千字
-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9.00 元





编委会

(按汉语拼音排序)

赵晓力
左亦鲁

阎天
张泰苏
章永乐

田雷
王希
王志强

刘晗
乔仕彤
宋华琳

黄宗智
强世功
刘东

丁晓东
甘阳
黄陀



田雷

主编

雅理

其理正，其言雅

理正言雅

即将至正之理以至雅之言所表达

是谓，雅理译丛

今天，《起火的世界》一书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仍如2003年问世时那样真确。任何国家在寻求市场经济时，都必须设法分散财富，而不能让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上。否则多数人的强烈积怨就会无可避免地爆发，就会对抗市场改革、反抗改革中时常出现的腐败，进而反对市场中致富的有钱有势的少数群体，因为他们将多数人远远甩在身后而不顾。

起火的世界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by Amy Chua

Copyright © 2003, 2004 by Amy Chua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 - 2013 - 8397 号

本书出版得到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丽达研究基金的支持

献给我的父母

中文版新版序言

自《起火的世界》于2003年首次出版后，世界各地的惊人发展都一再地印证着本书的论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 - dominant minority）的存在，令民主和自由市场很难和平共存。从东南亚到非洲再到中东，我们几乎在全球每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一动力的推演。

以缅甸为例，它近期的发展便几乎完全契合《起火的世界》的立论。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缅甸军政府1990年代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政策，致使财富明显地集中到全国人口中仅占极少数的华人手中，同时也致使针对华人的怨恨情绪在相对贫穷的缅甸多数人中愈演愈烈，而军政府与华裔富豪之间众所周知的腐败勾结又给这种怨恨情绪火上浇油。在缅甸人眼中，那些腰缠万贯的华裔阔佬是外来的掠夺者，他们完全无视缅甸人民的福祉。

过去这十年来，缅甸人对主导市场的华人少数族群的积怨有增无减。2011年，一名缅甸记者曾就“针对华人的种族仇恨”问题采访了一些缅甸人，他得到的回应包括：

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华人把我们的地方变成殖民地。很可能是（华人）在生意场上擅于操纵别人……华人阔佬往往举止粗鄙。

人们为外来者涌入我们的城市而感到不快。过去曾有（华人）在歌厅里殴打缅甸人。他们有钱，开好车。有些华人做坏事有一套，论责任心却一点没有。

他们来到我们国家，买我们的原材料，但他们不讲本地话，其中一些人还非常粗鲁。

早前，有个缅甸人打了一个华人，结果被判监六个月。出事那天，警察举着防暴盾牌，保护那五名华人撤到安全地带。这说明华人有靠山。我们对此感到不满。如果有缅甸人冒犯了华人，受伤和被警察抓走的肯定是缅甸人。

我觉得这里很多人都恨华人。在曼德勒，华人买了市区的房子，搞得很多缅甸人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

从2010年开始，缅甸朝政治解放与民主化的方向迈出了令人瞩目的步伐。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并获准参选（并将被选入）国会议员。2011年，缅甸的新任总统吴登盛放松了该国的新闻审查。正如一家餐馆形容的，“现在（缅甸人民的）声音可以听得到了。”2012年，缅甸最大的反对党——全民主联盟（NLD）恢复了合法地位。

与《起火的世界》一书的论点相当吻合的是，缅甸最近的民主化进程令其长期压抑的反中与反华情绪都得以发泄，并在缅甸多数族群支持下出现了一场针对华人少数族群的经济抵制。2011年，新当选的吴登盛政府回应公众的反对声音，叫停了中

国投资 36 亿美元的密松水坝项目。缅甸的外交辞令是：“现政府鉴于‘阿拉伯之春’的教训，要谨防缅甸也出现类似的风波。”类似因民众示威而搁置的项目还包括一个中国的铁矿和一条数十亿美元投资的铁路。在日渐高涨的反华情绪和泛滥的种族冲突之中，一些缅甸运动组织已要求中国就现有的对缅投资重新进行磋商。

类似现象也发生在马来西亚。最近一次选举中反华情绪重燃，马来人指责“中国海啸”导致选举出现“两极化”（马来西亚华裔少数民族群压倒性地对执政党投反对票）。尽管马来西亚最近几年经济稳定增长，但在这个国家里，据说主导市场的华裔少数民族群比马来人挣的钱多出四成，并且这个国家的大企业仍继续掌握在华人手中。2013 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违背了他 2010 年的承诺，没有如期削减给马来人的配给，而这一配给一直被华裔视为不平等和压制性的经济政策。不仅如此，令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社区感到愤怒的是，纳吉布反而施行了更加优先“刺激”马来西亚多数族群的附加措施。正如《起火的世界》曾经预见的那样，最近实行的这些政策驱使很多高学历的马来西亚华人离开了这个国家。确实，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大约有上百万的马来西亚“精英人才”（绝大多数是华裔）到国外生活，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政府采取了歧视性的、反市场的政策。

同一时间，华人在非洲也崭露头角，成为那里主导市场的少数新贵。在过去十年间，非洲的华人已经从原来的 10 万人激增到超过 100 万人。也恰如《起火的世界》所预见的，华人财富的明显日益增长——这往往被看作他们对当地人的轻视——

已经引起当地相对贫困的非洲多数族群的深深怨憎，随之引发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在赞比亚，中国投资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 2005 年发生了一次爆炸，造成 50 名赞比亚矿工死亡，由于赞比亚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仍允许该矿继续运营，对华人的积怨于是转化为民愤。2010 年，中资的科兰（Collum）煤矿发生两名华人经理射杀 13 名赞比亚矿工事件后，政府对这两名华人免于刑事起诉，同样再次激起民愤。遵循这一业已熟悉的模式，2011 年，萨塔（Michael Sata）竞选总统时迎合反华情绪，提出“赞比亚是赞比亚人的”这一竞选口号，并成功当选。萨塔当局随后取缔了科兰煤矿的开采许可，同时指控前政府与中国进行腐败交易，并为此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

普遍的反华情绪也在其他几个非洲国家出现。过去几年里，莱索托出现了针对华人的抢劫、诋毁性的电台广播节目及政治辩论。在博茨瓦纳，华人在事业上的蒸蒸日上导致该当局于 2009 年提出立法，禁止华人再涉足服装贸易。到了 2013 年，该国总统伊恩·卡马更明令减少华人参与政府项目。2009 年，安哥拉的华人商会公布了针对华人业者的暴力事件，数据显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两到三起。据报道，这些暴力是源于“华人公然在逐步接管”首都卢安达的各项事业。

当然，在当今世界上的少数族群中，非洲与东南亚的华裔族群绝不是其中唯一受到多数族群威胁的。相反，类似的境况几乎在各大洲每个地方都有上演，在中东尤其如此。

与那些坚持认为“市场与民主总是手牵肩并肩”的人所说的相反，“阿拉伯之春”这一肇始于埃及的事件再次显示，群众运动可以是反市场的，并可能引发宗教原教旨主义、对妇女

权益的侵犯以及暴力等问题。同时，在如今正陷于血腥内战中的叙利亚，占72%人口的相对贫穷的逊尼多数派，长期以来对以阿萨德家族为首的阿拉维少数派统治深恶痛绝，而阿萨德家族的私人财产据称有十亿美元之巨，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财富。

今天，《起火的世界》一书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仍如2003年问世时那样真确。任何国家在寻求市场经济时，都必须设法分散财富，而不能让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上。否则多数人的强烈积怨就会无可避免地爆发，就会对抗市场改革、反抗改革中时常出现的腐败，进而反对市场中致富的有钱有势的少数群体，因为他们将多数人远远甩在身后而不顾。

致 谢

我对许多人在本书上的贡献都心存感激，但迄今为止，我最该感谢的还是我的先生杰德·鲁宾费尔德（Jed Rubinfeld）。十多年来，我所写下的文字他每字必读。我有幸成为他厚道而慷慨的受惠者。

我还对几位朋友和同行深表谢意。斯乔比·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和罗素·皮特曼（Russell Pittman）都通览了这部手稿的初样，并给予我极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其他在个别章节上提出过宝贵意见的人士包括：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约柴·本克勒（Yochai Benkler）、欧文·菲斯（Owen Fiss）、奥尔·戈扎尼（Or Gozani）、乔纳森·海奇特（Jonathan Hecht）、唐纳德·霍洛维奇（Donald Horowitz）、马丁·迈克尔（Martin Michael）、埃奇·瑙洛伊（Elchi Nowrojee）、杰夫·鲍威尔（Jeff Powell）、乔治·普里斯特（George Priest）、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詹妮弗·罗斯-戈登（Jennifer Roth-Gordon）、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阿伦·谭（Alan Tan），尤其是勇敢地纠正了我的一些北美式的误解的阿玛莉亚·阿纳亚（Amalia Anaya）、冈扎罗·门迭塔（Gonzalo Mendie-

ta) 和乔治·帕蒂诺 (Jorge Patino)。当然, 书中如有纰误, 我将一人负责。

许多研究助理为此书贡献了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的时间。在此, 我特别希望感谢伊瓦纳·辛格尔 (Ivana Cingel)、阿拉纳·霍夫曼 (Alana Hoffman)、大卫·彭纳 (David Penna)、罗里·菲梅斯特 (Rory Phimester)、拉拉·斯莱奇塔 (Lara Slachta)、布伦特·威布雷 (Brent Wible), 尤其是贾森·蔡 (Jason Choy), 他的奉献和随时乐于相助的好意令我非常感激。我过去的一些学生也给了我极为有益的协助, 并时时向我提供当地的专家意见, 他们是: 米盖·阿凯奇 (Migai Akech)、霍马云·阿法扎达 (Homayoon Arfazadah)、休伯特·贝朗 (Hubert Baylon)、詹妮弗·贝克尔 (Jennifer Becker)、詹妮弗·贝尔 (Jennifer Behr)、伊肯纳·埃米赫鲁 (Ikenna Emehelu)、杰夫·菲德曼 (Jeff Federman)、本·汉斯 (Ben Hance)、利迪阿·基达尼 (Lidia Kidane)、尼姆罗德·科兹洛夫斯基 (Nimrod Kozlovski)、比安卡·洛克辛 (Bianca Locsin)、托尼·穆尔 (Toni Moore)、冈扎罗·纳扎拉·穆拉诺维奇 (Gonzalo Zeharra Mulanovich)、克里斯蒂纳·欧文斯 (Christina Owens)、凯奥·马里奥·达·西尔瓦·佩雷拉·内托 (Caio Mario da Silva Pereira Neto)、汤姆·佩里罗 (Tom Perriello)、埃米莉·皮尔斯 (Emily Pierce)、尤齐·罗纱 (Uzi Rosha)、戴米安·斯柴博 (Damian Schaible)、比尔·谢弗 (Bill Scheffer)、丹尼尔·谢里登 (Daniel Sheridan)、赛伊马·索马尔拉 (Saema Somalya)、苏昌·图里 (Suchon Tully)、安德斯·沃克 (Anders Walker)、坎查纳·王 (Kanchana Wang) 以及塔米·扎瓦里因科 (Tammy Zavaliyenko)。

有很多人为此书接受访谈，我对他们付出的时间和他们的坦率表示感谢。在书中多数地方，我为了保护他们的匿名权而更改了他们的名字及其他可以辨识身份的因素。

本书的基础是我以前的三篇学术文章：《自由市场民主的矛盾：发展策略的再思考》[“The Paradox of Free Market Democrac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1 (2000): 287 ~ 379]; 《市场、民主和种族：关于法律和发展的一个新范式》[“Markets, Democracy, and Ethnicity: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Law and Development”, *Yale Law Journal* 108 (1998): 1 ~ 107] 及《私有化与国有化的循环：发展中国家市场和种族之间的关联》[“The Privatization – Nationalization Cycle: The Link Between Markets and Ethni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lumbia Law Review* 95 (1995): 223 ~ 303]。我必须提到杜克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帕梅拉·加恩 (Pamela Gann) 和凯瑟琳·巴特利特 (Katharine Bartlett)，还有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安东尼·克罗恩曼 (Anthony Kronman)，没有他们的友谊、支持和慷慨，我是不可能完成上述文章的。

耶鲁法学院图书馆的吉尼·科克雷 (Gene Coakley) 的精力充沛和足智多谋令我敬畏，也使我深深地仰慕和感激。我还想谢谢米丽亚姆·亚伯拉莫维兹 (Miriam Abramowitz)、尼科尔·杜威 (Nicole Dewey)、弗朗西斯·哈马彻 (Frances Hamacher) 和帕特丽夏·斯皮格尔哈特 (Patricia Spiegelhalter) 的协助与鼓励。

我的爱和感念献给我的女儿索菲娅和路易莎·蔡-鲁宾菲尔德，为了她们的耐心和悟性，也为了她们在我沮丧时做我的